

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高校图书馆研究

李莘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的 高校图书馆研究

李莘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高校图书馆研究 / 李  
莘著. —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180-4314-9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院校图书馆—图书馆发  
展—关系—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 G259.256 ②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2127 号

---

责任编辑: 汤 浩

责任印制: 储志伟

---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 A40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4

销售电话: 010-67004422 传 真: 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mailto:faxing@c-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2119887771>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92.50 元

---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 前 言

高等教育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出现的，并且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变化。本书着重研究近现代（一般指鸦片战争以后）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高校图书馆。在研究图书馆的发展情况方面，主要对馆舍、文献、人员、经费、用户教育等进行论述。

本书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以时间为线索，本着以史为据、史论结合的原则，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文献中查找史料，在充分吸纳学界同人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力求翔实生动地再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高校图书馆的整体面貌，并从中认识我国高校图书馆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及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

本书由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李莘著。作为一部研究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高校图书馆的通史性著作，该书涉及我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但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若有疏漏甚至错谬之处，恳请学界同人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李莘

2017年8月

# 目 录

<b>第一章 我国近代精英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b> .....	001
第一节 晚清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	001
第二节 民国前期的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	042
第三节 民国后期的高等教育与高校图书馆.....	068
<b>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b> .....	083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稳健发展时期的高校图书馆.....	083
第二节 新中国曲折前进时期的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	102
第三节 1976年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恢复、初步发展及高校图书馆的复原..	117
第四节 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高校图书馆发展.....	138
第五节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高校图书馆.....	162
<b>第三章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纵深推进及高校图书馆建设</b> .....	177
第一节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纵深推进概览.....	177
第二节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纵深推进给高校图书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79
<b>第四章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各类型高校图书馆</b> .....	193
第一节 我国高校分类简介.....	193
第二节 我国各类型高校图书馆.....	195
<b>第五章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未来建设的思考</b> .....	216
<b>参考文献</b> .....	219





# 第一章 我国近代精英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

近代阶段主要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近 110 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晚清、民国前期（1912—1927）和民国后期（1927—1949）三个阶段。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萌芽、兴盛到逐渐被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取代的时期，高校图书馆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也形成了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节 晚清高等教育及高校图书馆

### 一、晚清的高等教育

鸦片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加紧侵略，清王朝丧权卖国、苟存于世，民族矛盾不断加剧，民众起义不断，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部分接受办“洋务”、兴“西学”的主张，在 19 世纪 60 年代掀起了“自强”“求富”“新政”的洋务运动，我国近代精英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之后的维新运动也使高等教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 （一）洋务运动时期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

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至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 30 余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雏形初现的阶段。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加剧的国际环境下起步的，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伴随着早期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而起步的。19 世纪 60 年代，以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主要代表的统治阶级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标榜“自强求富”、兴办“洋务事业”，希望仿效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兴办近代军用工业以“求强”，创办近代民用企业以“求富”，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以“新政”。期间，创办了一定数量的“西文”教育和“西艺”教育专门学堂。这些学堂的创办，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已经产生。



## 1. “西文”教育专科学堂

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著名“西文”专科学校有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以及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这些学校以培养满族的翻译人才为目的，以便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不受人欺蒙”。京师同文馆先设英语，后增加俄、日、法、德等国的语言，不过英文一直居于首要地位。1866年，增设科学馆，学科扩大至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科，学习年限8年，前几年偏重语言文字，后几年加上一些科学知识。该学堂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的新型高等专科学校，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次年改称“译学馆”。上海广方言馆成立于1863年，是继京师同文馆之后设立的第二所外国语言学校，广方言馆初建之时，即设立了英文、法文和算学三个学馆。之所以设算学馆，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它是学习西学的基础，“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学亦难施之实用”<sup>①</sup>。迁入江南制造局后，又增设了武学馆及铁船馆。湖北自强学堂是为培养洋务、翻译、教学人员创办的一所学堂。学堂设于武昌，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设有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学生150人，算学一堂，并附译西书。1902年，更名为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学生“分往各省任教习，或称翻译，并办理厂局商务各事”，培养出一批工矿商务管理和翻译人才。

## 2. “西艺”教育专科学堂

在“西艺”专门教育学堂方面，兴办的专业技术学校和军官学校主要有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创办的广东水师陆师学堂以及1895年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

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学堂，这是清末最早的海军学校。次年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及造船；后学堂习英文及驾驶。两学堂均学数学、天文、地理、画法等课，并读《圣谕广训》及《孝经》，兼习策论。1913年，前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海军学校。

天津水师学堂创办于光绪七年（1881）。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教练，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定条例和计划。经费由北洋海防经费内开支。分驾驶、管轮两科，驾驶科专习管驾轮船，管轮科专习管理轮机。开设英文、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重学、天文、舆地、测量、驾驶、化学、格致等课程，兼习经史文义，训演外国水师操法。学生入学年龄14~17岁，学制5年，其中4年在学堂学习各种课程，1年上练船实习，学

<sup>①</sup>戴逸、吴士英：《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洋务运动与边疆危机（3）》，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习船上诸艺，如火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线、用帆诸法等，要求于驾驶诸学能明体达用。毕业后授水师官职，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

广东水师陆师学堂于光绪十三年（1887）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就原博学馆进行改设，分水师和陆师。水师习英文，分管轮与驾驶两项。管轮习机轮理法、制造运用；驾驶习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法。陆师习德文，分马步、枪炮、营造三项。此外，均习四书、五经、史书等。水师和陆师初设学额各70名。后水师两项各设70名，学额共210名。3年结业。学生每年在堂学习9个月，在船或营练习3个月。水师学成后，需上船实习，初定1年，后改3年。学生除了原博学馆旧生外，还招收福建船政学堂及天津的武弁和文童。吴仲翔为总办，英国人李家孜为水师教习，德国人欧披次为陆师教习。1893年改名“广东水师学堂”。1889年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及公法学，各设额30名。公法学学生由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考选。聘英国人赫尔伯特（Harper）、葛路模（Percy Groom）、骆丙生（H.H. Robinson）等分别教授公法学、植物学、化学。

天津武备学堂为近代最早的陆军学校。光绪十一年（1885）由李鸿章奏设于天津。仿照西洋陆军学校规制，聘用德国军官教授。挑选北洋各营中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兵百余人入堂学习，其中有部分愿习武事的文员。学习内容有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新法。另外，还有演试枪炮阵式，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1年毕业，发回各营任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始分马、步、炮队三科。

湖北武备学堂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在武昌设立。报考学生一律经过严格考试，还要经过3个月的试读，将不合格者剔除，留下实际所需要招收的人数。学生学习的课程由讲堂和操场两部分构成，讲堂功课有军械学、算学、测量学、绘图学、枪炮弹药的构造及使用和维修方法、枪队炮队马队营阵之要、营垒桥道制造之法、山川险易攻守进退之机；操场功课有操习枪炮、骑术、营垒工程、行军、打靶、演试测量、体操等。由此可见，该学堂具有招生质量较高、课程较全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这些洋学堂的设立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它第一次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实行了改革，开创了我国新教育的先河，特别是在学科专业上新增了一些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外国语言文学课程，这一教学内容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我国高校图书馆的藏书结构。此后，中外图书兼顾，人文学科书籍、社会学科书籍与自然科学技术书籍并重，逐渐成为高校



图书馆的藏书理念，高校图书馆的藏书面变得更广、结构更为合理，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更大了。

### 3. 中西合璧的新式书院——格致书院

这是我国第一个科学教育机构。据记载，格致书院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知新堂”，内有天球仪、地球仪、物理和化学仪器、铁器汽机等；二是讲论学问之堂，备作中外“院师”为学生讲授课程的场所；三是书房，内藏已译成中文的格致书。由于书院经费困难，迟至1879年才开始正式招生，1880年2月开学授课。据当时书院发布的《招收生徒启》称，格致书院当时设有两科，任学生自选：一是学西国语言文字，另一是学格致实学。至1895年，格致书院的课程作了改革。按照傅兰雅设计，书院设立“六学”（即六个专业），包括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并各按西法排定课程。学生可任选一学（专业），逐次学习各课程。学生自备学习用书。以自学为主，遇有难明之处，可按期到院询问。学生每学完一课，可前来考试，75分以上合格，发给该门课的课凭（合格证书），再学别课。学完一学（专业）全课，发给毕业文凭，证明其人“已精此门学业，足为行用”。由此格致书院的教学体系与方式已接近西方的高等学校。书院设有博物院、藏书楼，作为学生实习和阅览的场所<sup>①</sup>。格致书院存在时间达40年，为中国培养了早期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技能的人才，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11年，格致书院宣布停办。

## （二）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时期的高等教育

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维新派兴起，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于是主张通过改良中国的教育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sup>②</sup>他的这一观念逐渐被国人接受。于是维新派领导人及清末“新政”领导人都把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一批培养高级人才的学校纷纷建立起来。

### 1. 维新运动时期的高等教育

维新运动时期的高等教育以一批新式高等学堂的建立以及承担高等教育的书院的发展为主要内容。

#### （1）新式高等学堂的教育

① 维新派领导人创办的“新学”学堂。维新派领导人不仅大声疾呼要“废科举、兴学校”，还亲自创办学校，如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自任总教授、总监督，撰《长

<sup>①</sup>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sup>②</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9页。



兴学记》作为学规。并将其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作为主要讲授教材，“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即探讨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及其沿革得失，寻求拯救中国的办法。学堂教学内容包括中国经史、诸子之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音乐与体育等，并有课外的演说、游历等活动。鼓吹托古改制，按照改良派的需要塑造孔子、改造儒学。学堂还办有图书馆和仪器室。学堂于光绪二十年（1894）被清政府解散，1896年又恢复讲学活动，1898年戊戌政变后终于被封禁。

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主办“时务学堂”。目的是“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宣传变法维新。熊希龄任提调（校长）。学堂分为两部，学堂的功课章程包括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学生所读的书也分两类，即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其总学时比例为六比四。每生每人置札记册一本，每天把所读书的页数和心得记于其上，每5日交一次，由院长批答给分，并给予奖惩。学堂经费除了绅商捐集外，并由官府逐年酌量发给。梁启超以万木草堂为蓝本，制定《学约》十章，向学生灌输变法维新思想。师生旦夕讲论，谴责君主专制，鼓吹平等、民权之说。风气所及，于省内外产生相当影响。学堂成立不久即遭到顽固士绅王先谦等激烈攻击，戊戌政变后改为求实书院。

严复于1894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校址在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1897年2月正式开学。学制3年，分初次学期与特班授课的二次学期。初次学期的课程，英文为公共必修科，另设文学门，讲授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化学、人种论等；艺术门，讲授标学、几何、代数、三角术、格致学、天学、地学、人身学、制造学等。在学习中，学员对其所列科目，各可按自愿，分门专习。3年期满毕业，对有官阶者，保荐以加陞阶；无职人员，准做监生参加乡试。戊戌政变，学堂停办，其设备、图书、仪器等物移交京师大学堂。

1897年，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发起捐资创建“浏阳算学馆”。馆址在浏阳县城内的奎文阁。“浏阳算学馆”本着“业有专长，学求实用”的原则，以算为主，其他格致诸科，均以自学为主。聘请“精于算法，兼通西学”的人为掌教，置监院1人，管理学员，督促稽查功课。规定招收“文理通顺，能晓珠算”、年20~30岁的学员，由总掌教出题面试，如原系生员，可免试文理。取录分额内、额外，额内学期3年，有缺由额外学员递补。馆内备有《御制数理精蕴》《几何原本》以及古今经史、算术、中外科学图书，供学员参考查阅。考试每月逢八有馆试，3个月有季课。平时学员要将学习所得，记入学习日记呈交查阅。不久，即停办。



陈芝昌、邓家仁等捐资在广州设立“时敏学堂”，开设国文、外语、算术、史地、理化、体操、图画诸课。1902年曾派10名学生自费留学日本。1919年停办。该学堂制定的《时敏学堂章程》，对购买图书和学生借还图书等进行了规定：

购图经济以地理为本，地理非图不明。今拟购各直省、各国舆图，其西籍所载鸟兽草木各图，金煤各矿质，均拟采购。

设借书以便观览，堂内诸君，居处不同，境遇各异，岂能尽人入堂肄业？且房舍有限，或不能容，拟设借书部一卷，分送同人，俟捐款缴清，取有回条，再凭回条至学堂换借书，凭部一本，凡借书还书，须据部到掌书处，给回收发字样。省城限三日为一期，四乡限十日为一期，上期书还，乃借下期，逾期不还，掌书催之。延至三期，永远不借，或有遗失污损一册者，酌议赔值，或令抄回三册。以上照全书原值赔偿，另购新本，其旧本仍充公籍，不赔者亦永远不借。不与会者不借。

②京师大学堂。这是我国近代由政府正式开办的最早的大学。“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领导人的主张，并发出了几十条改革命令。关于高等教育方面，最突出的是筹办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向光绪建议在京师建立大学堂；继而孙家鼐上奏表示支持，并补充提出了具体的分学科、请教习等建议。1898年，维新运动开展，维新派及一些开明官员如御史王鹏运重新提出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要求，得到光绪帝的明确支持，命令总理衙门“妥筹具奏”。并在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中，催促总理衙门尽快办理。后总理衙门上报了由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并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以美国教士丁韪良为总教席，正式办理京师大学堂。经过5个多月的筹建，京师大学堂于12月正式开学。由于戊戌政变的影响，入学学生很少，学科内容大为缩减，只开设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二堂。维新运动失败后，虽然新政停止实行，但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仍然继续进行。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中央官办大学之一，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其中提出的办学方针有二：“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该章程为大学堂设置的课程有两类：普通学科类，即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文学、体操和初等的数学、格致学、地理学等，为所有学生所必学；专门学科类，即政治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和高等的数学、格致学、地理学等，由学生任选一门。并规定凡30岁以下的学生必须选学一门外语。大学堂招收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翰林院编检、知县以上官吏及大臣子弟中愿入学肄业者；另一类是各省中学堂领有文凭咨送来



京肄业者。关于学生的出身，拟请将各省中学堂毕业并领有文凭者作为举人出身；其升入大学堂，毕业而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出身，并因其所长而授以职事。<sup>①</sup>

③天津中西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朝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员也积极筹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有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即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系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天津中西学堂利用博文书院的校舍建成，目的在于造就军事、外交、制造、工艺等各方面人才。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学制均为4年，盛宣怀要求“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可进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可进入专门之学”。这是中国学校分级之始。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学堂则相当于大学预科。头等学堂的4年学习中，第一年课程不分科，学生学习通习科目，包括英文、数学、制图、物理、化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理财学等，余下的3年各就性质相近学习一种专门科目，专门科目有法律学、工程学、采矿冶金学、机械工程学、电学五科。学生毕业后，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任洋务职事。二等学堂不分科，招收13~15岁、读过“四书”、并通一二经、文理稍顺者为学生，课程有英文、数学、各国史鉴、舆地、格致等。学生按班次递升，毕业后即可升入头等学堂。1898年奉京铁路局之请，学堂又特设铁路专修科。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学堂被毁，学务被迫中止。1903年重建，改名为“北洋大学”。

上海南洋公学是仿天津中西学堂，于上海筹设的新式学堂，侧重培养以通晓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又了解西方洋务的政治人才。因学堂以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每年所捐银10万两为经费，故名为“公学”，所招学生不分籍贯地区，率经甄试选录。该学堂体制较为复杂，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八日开学，先设师范院，通过考试选取学生40名，多为举贡监生出身，兼习中西各学，培养目标是“明体达用，勤学善诲”。合格者选为公学中院、上院教习，这是中国师范教育的开端。同年又仿日本师范附属小学之法，设外院（光绪二十五年，外院生悉数递升中院，外院即取消）。光绪二十四年设中院（相当于中西学堂的二等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00）建上院（头等学堂），实现四院并设计划。其《章程》规划了一种新的学制，外、中、上3院各120名学生，按程度分四班，每年依次升班，上院4年学成给予毕业文凭。这种学制成为中国近现代大、中、小学3级制的雏形。次年再设译书院，选译东西洋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军事、教育、商业、史地等书。1900年，上院校舍落成时，先由师范生迁入使用。公学的教育内容“以

<sup>①</sup>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40页。



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为国家培养内政、外交、理财方面的人才。

## （2）书院教育

在维新运动中，对书院的改进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一部分注重学术性的传统书院和新建的学术性书院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在清末承担着高等教育的任务。

①传统学术性书院的高等教育。在清末，一部分传统书院仍承担着传播高深知识、研究高深学问的任务，如湖北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及四川的尊经书院等。

两湖书院是湖北省名气最大的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武昌。由湖南、湖北两帮茶商捐助书院经费，专收两湖士子入学，故名“两湖书院”。当时新学方兴，书院课程除了经、史、辞章外，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及兵操等新学科。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书法家杨守敬、数学家和翻译家华蘅芳、音韵学家沈勇植以及易顺鼎、杨锐、汪康年、姚晋圻、周树模、陈三立、屠寄、邹代钧等名流都曾任教该院；自立军领导人唐才常、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都曾是两湖书院学生。1903年，两湖书院改为“湖北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实为大学预科），不久又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

经心书院于同治八年（1869）由湖北学政张之洞创设于武昌，招收25岁以下肄业者，以5年为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酌照学堂办法，改定课程为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分年轮习，无论所习何门，均兼习算学，选习西语西文者听便。次年将课程改定为天文、地舆、兵法、算学，并专设经史一门，兼习兵操。设院长、总教习整饬学规，考核品行（称为“行检”），并用宋太学积分法每月终核其所业分数之多寡，酌定进退。办院宗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洗帖括辞章之习，唯以造真才、济实用为要归。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将它改设为“存古学堂”。

尊经书院创办于1875年，是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当时成都虽有锦江书院，但所教课程偏重时文，成就不大。1873年7月，具有洋务思想的知识分子张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又担任四川学政。张之洞到川后，除了采取一些措施，以剔除科场积弊、整顿学风外，还在成都城南创办了尊经书院，进而对四川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院首批学生是从全川3万余名生员中按学问人品择优录取100人。以后，每逢科、岁两考，在各府县考取第一二名秀才、贡生中调取入院学习。所学课程为经、史、小学、辞章，尤重通经。书院购书万卷，延请名师，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张之洞曾编撰《辘轩语》和《书目问答》作为读书指导，又撰写《尊经书院记》，说明办学宗旨是培养蜀中人才、



通经致用。1879年，设立尊经书局，刊行书籍。由于张之洞、王闿运等倡导通经致用，注意发掘人才，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因此尊经书院成了当时四川学术文化的中心，以人才荟萃名闻全国。学生们治学严谨，思想活跃，喜欢议论时政，臧否人物，这就为改良主义思想在四川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此外，清光绪九年（1883）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在太原还创建了令德书院（又称“令德堂”，1900年停办，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广州城西北创办了广雅书院（1901年改名为“两广大学堂”），这些书院均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

②新办书院的教育状况。与此同时，清末还创办了一批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新式书院，如杭州的求是书院等。求是书院位于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3弄5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浙江巡抚廖寿丰、杭州知府林启发起，以普慈寺为院址，由林启负责筹建创办，并定名为“求是书院”。这是浙江大学最初的前身，也是浙江在省城率先建立的一所新式高等学堂。1897年5月21日开学，陆懋勋、陈仲恕主持教务。书院以“振兴中华、御侮图强”为办学方针，注重实学，反对科举，在教授英语、数学、化学、地理等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文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强意识。该书院对考试制度也进行了较大的变革，明确规定考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并规定在校学生于“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这是对当时考试制度的重大突破。求是书院又是全国实行选送高才生出国深造较早的学校。该书院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如邵飘萍、陈独秀等。书院屡经更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翌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又改称“浙江省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将其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定名“浙江大学”。

总之，从清末兴学热潮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总体趋势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随着晚清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图书馆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 2. 清末“新政”时期的高等教育

清末“新政”，政府对高等教育更加重视，恢复了京师大学堂并将其作为全国大学的典范，一批大学堂如南洋公学等获得了发展，一批为推行新学培养师资的优级师范学堂纷纷建立，一批承担高等教育任务的书院得到彻底改造。所有这些，都成为清末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容。



### (1) 京师大学堂的恢复

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太后由西安回銮北京后,委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着手恢复京师大学堂。张百熙思想开明,热心于新教育。他主张脚踏实地,从头做起,先办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包括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艺科(包括声、光、化、电、农、工、医、算等);速成科设仕学馆、师范馆。预备科为3年后办大学本科作准备,速成科则为收急效。

京师大学堂按照张百熙的筹划走上正轨。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举行招生考试,结果仕学、师范二馆共录取学生180余人。第二年增设了进士馆、译学馆、医学实业馆。1904年预备科招生。1910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学生400余人。至此,京师大学堂初具规模。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 (2) 南洋公学的发展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南洋公学设立特班,作为应考“经济特科”之预备,课程包括课艺、英文、数学、格致、史地、名学、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史等。同年又设政治班,由师范生及中院高级生选人,课程包括宪法、国际公法、行政纲要、政治学、经济学等。此外,因外院取消后,中院招生渐感不易,故1901年再设附属小学,分预备、高等两级。1906年改政治科为商务科,添设铁路科;1907年停商务科,由此成为专办工科的大学。从1908年到1921年,工学增设电机科、船政科(后分离独立设校)、土木科(由原铁路科改设)、电气机械科(由电机科改设)、铁路管理科等。设科变化表明,1907年以前,由于政局的发展以培养政治经济人才为主;1907年以后,以培养工业交通人才为主。校名由于经费来源问题而不断更改,1905年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2年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同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合并,始名为“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曾造就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工业交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南洋公学彻底改革了封建教育的办学形式和教育内容,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新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3) 对书院的彻底改造

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发布上谕指令:“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同年6月,光绪皇帝又诏令废除“八股”,以示革除旧式教育的决心。但是在此后的7年间,书院、“八股”并未能真正废止。表面上看,



这是因为除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及其延续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是慈禧太后钦定的之外，清朝政府中对新式学堂建立与否的争执既激烈又毫无结果，张之洞早就提出的改书院为学堂的折中办法未能实行。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科举取士的制度仍然存在，士子们仍能通过官学化了的书院教育考取功名，走上仕途。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皇帝诏令“著即丙午（即1906）科为始”废止科举，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这就断绝了以科考为本的旧式教育之路，而使书院教育制度彻底瓦解。一时间，旧式书院纷纷关闭，新式学堂接连开办。部分承担高等教育的书院被停办，大部分改办为新式大学堂。

#### （4）优级师范学堂的建立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月十日，慈禧太后回銮北京的第三天，便委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着手恢复京师大学堂以示兴学的决心。二月十三日，张百熙在《奏陈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疏》中说，因考虑到短期内不可能办起大学预科及分科的实际情况，故先“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sup>①</sup>附设于大学堂，以便能够尽快招生上课。此举不仅能“使京师大学堂就此恢复”<sup>②</sup>，更能体现出他所拟奏《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的思想。经过紧张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十一月十八（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这一天就成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奉旨重新审订学堂章程。新章程重视师范教育的程度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又有了发展，即除了主张“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以师不外求为成效”外，还将师范教育分作优级（即高级）和初级两个级别，在初等级别中又有完全师范科、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员讲习所的区别，以培养中、小学正、副教员不同层次的师资。这就使师范教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

光绪二十九年年底（1904年1月），新章程颁行，即《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及各省城宜各设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初级师范及中学堂教员”。随即在京师和各省纷纷设立起了优级师范学堂以培养初级师范及中学堂教员，成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萌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更名为“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1908年，优级师范科从京师大学堂里分离出来，发展为一所独立设置的学校。其任务仍是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等学堂正、副教员和管理员。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建立是我国独立设置高等师范学校之始，也是我国的师范教育开始有了一个独立组织系统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171，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171，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页。



的标志。此后，各地纷纷设立师范学堂。

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为选拔本省送往京师大学堂及留学日本的师范生，令山东高等学堂暂设师范馆安顿这批学生，待学生分派完毕，师范馆即行裁撤。1903年复于济南创设山东全省师范学堂，以方燕年为监督。清宣统二年（1910）山东全省师范学堂的校名改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学堂内编制依旧。

1903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于南京。1905年，三江师范学堂改称“两江师范学堂”，后又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1905年春季，成都创办四川师范学堂。同年，广州创办两广速成师范馆和管理练习所，附设初级师范简易科，后改名为“两广师范学堂”。

1906年，袁世凯于天津创办北洋师范学堂，是为后世影响较大的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前身。同年，安庆创设了安徽优级师范学堂；兰州将兰山书院改办为“甘肃优级师范学堂”；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将两广师范学堂升格改办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获准后即以广东贡院旧址改建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校舍”；四川师范学堂校名改为“四川通省师范学堂”。

1907年，开封河南师范学堂升格为河南优级师范学堂，附设初级师范；同年，福建两级师范学堂中的优级师范班更名为“福建优级师范学堂”而独立设置，是福建省最早的高等师范学校。

1908年，学部奏议建女子师范学堂于北京，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这一时期建立的还有直隶优级师范学堂、江西优级师范学堂等。这些优级师范学堂的建立，为后来的高等师范院校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 二、晚清高校图书馆发展的背景

晚清时期，除了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校图书馆建设的需要外，随着西方藏书理念的传入及国人对藏书的思想宣传，国人创办藏书楼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促使国人更加重视高校图书馆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图书馆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 （一）晚清国人的藏书理念

19世纪后期，西方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一些有志之士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影响、推动了中国藏书工作的性质的变化。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在论述书院、学校、学会等问题时，都呼吁仿效西方图书馆，创立可供公众阅览的“书藏”，